

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

谭来兴◎著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站在新世纪历史长河的源头，回顾20世纪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历程，我们感慨万千。

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艰难曲折，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巨大，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验宝贵，启示良多。中国不仅要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且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为路径。



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

谭来兴◎著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站在新世纪历史长河的源头，回顾20世纪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历程，我们感慨万千。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艰难曲折，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巨大，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验宝贵，启示良多。中国不仅要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且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为路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谭来兴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

ISBN 978-7-01-007500-6

I. 中… II. 谭… III. 现代化建设-研究-中国 IV. D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7319 号

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

ZHONGGUO XIANDAIHUA DAOLU TANSUO DE LISHI KAOCHA

谭来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45 千字

ISBN 978-7-01-007500-6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论	001
第一章 两种现代化理论的比较研究	017
第一节 一个需要破除的理论误区	01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 特征	022
第三节 西方现代化理论述评	056
第四节 两种现代化理论之比较	084
第二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起步与曲折	097
第一节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含义和分期	097
第二节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生	104
第三节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与挫折	117
第四节 中国早期现代化失败的历史必然	152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与拓展	170
第一节 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 必然结果	171
第二节 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78
第三节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 辟与拓展	211
第四章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若干理论 思考	277
第一节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277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关系	286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面临的重大 历史难题	293
结束语 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01
参考文献	307

导 论

研究现代化的最大困惑,或许来自对“现代”和“现代化”两个词的理解。“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是从“现代的”(modern)一词引申而来的。这两个词不仅包容性大、比较含糊,而且内涵与外延是动态的。不过,这种包容的模糊性反而增强了其吸引力。

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考证,“现代的”一词直到 1585 年才开始使用。我们暂且不论人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现代的”这一词,但在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里,“现代的”一般是相对传统而言。所谓传统,是指自古代和中世纪沿革而成的一种文明,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道德观念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历史的演变显示,从“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逐步以加速度运转。在短短的数百年的时间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为此,人们才用“现代的”这一词汇,以示与传统的区别。

“现代的”一词早在16世纪就已问世,但是,“现代化”一词则是直到半个多世纪前,才开始为学术界使用并作出相应的界定。20世纪中叶,人们越来越置身于一个多层次的变化发展的社会中,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创建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并创办了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1951年,该杂志编辑部在芝加哥大学举行学术会议,讨论当时有关贫困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美国对外政策以及有关的各种理论。与会者感到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比较合适。“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广泛使用。而率先对现代化的含义和标准进行探讨,则是1960年8月的日本根箱近代日本研究会议。此次会议提出了8条现代化的标准:(1)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广泛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经济和事务中的广泛参与。(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散,导致个人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的社会机构的存在以及在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国际关系)。^①显然,这8条标准

^① [美]西里尔·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都是描述性的,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征,可并不是关于“现代化”的明确定义。此后几十年间,海外学术界试图从各个角度来界定“现代化”。然而,至今未能对“现代化”的含义达成共识。概括起来,海外学界对“现代化”的定义,有如下几类:第一类认为,现代化是由西方工业化引起的,然后又在其他地区兴起工业化的事件。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是较先进社会对较落后社会的冲击而引发的种种变迁过程,它是由国际或社会间的交流所融发的变迁现象,是一个传统社会试图工业化时发生于每一个部门内的一连串变迁。第二类认为,现代化可以被看做安排社会生活和实现行动方式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环境支配的增长。现代化涉及人类对理性目标寻求能力的提高,现代化是社会各层面理性的增长,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价值取向的世俗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现代化意味着这些新的特质在社会中出现并迅速扩散。第三类认为,现代化是指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达到一定的水平,即自动进行的水平。具体地说,在现代化起飞中的社会必须有能力抵抗低速,有能力朝气蓬勃地发挥出新主导部门的潜在的扩散效应。第四类认为,现代化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转变——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从全球学的意义上说,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完成。^① 上述定义,都是站在不同的研究立场上,从各门学科中提炼出自己感兴趣的社会事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难以就一个简单明了的现代化定义达成普遍的共识。

^① 转引自张琢:《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呢?

20 世纪 80 年代,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扬弃”,理性地反思了中国百年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努力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给“现代化”以科学的界定:“从历史的角度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革命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①因此,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而不是无法把握的无限发展的过程。实现现代化需要利用本国的传统,这就决定了具有不同历史传统的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

工业化为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构成了现代化最主要的、最核心的部分。但是,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这二者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实际上,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早在 16 世纪就开始启动了,而当时根本没有工业化。16 世纪,一些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就已经发展到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去推动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自然经济的局限。在此基础上,农业中出现了农场式经营,手工业中出现了工场式经营,从而促使了人身自由的雇佣关系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7 页。

取代原有的农奴制、行会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此后,在近五个世纪的持续演化中,它历经三个大的发展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第二次浪潮是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工业化在欧洲核心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甚至欧洲以外的异质地区扩散;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其发展范围已由核心地区飞快地扩散到全球,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上可见,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者把现代文明等同于工业文明。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发生于其中的主要特征,就称为现代性。现代性构成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结果。根据对现代化的理解,现代性主要表现为:

——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表示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即现代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的、小农的和分散的生产及其水平。它是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其他方面进步的第一位因素。根据生产力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水平,可以区分为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层次。

——经济市场化。现代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类型,其基本模式是对社会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当然,由于其实际形成中的特点,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种种具体的差异。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则是其实质的东西。

——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传统的乡村或逐步变成现代城市,或为城市化所改造,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不仅是居住地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延伸到社会生活、直至精神

生活方面的一系列转变过程。

——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社会物质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将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一步步提上现代社会的建设日程,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制度规范。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将更加重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且在制度文明建设中推进。

——历史活动的主体化。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现代化运动的最终意义,应当是人向其本质的回归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经济结构上,还是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现代化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现代化,即人在历史活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在现代化过程中,人民群众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历史的主体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牵动着世界发展的进程,备受世人瞩目。基于此,“中国现代化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专著已经有近百部问世;至于有关学术论文,更是数以千计。

国外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海外学者在风靡一时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影响下,十分重视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尤其醉心于探讨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综合起来,五十多年来的研究情况有如下几类:

第一,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即20世纪50至60年

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倾向于把中国的传统社会看做是一个缺少变化的、稳定的或平衡的社会,即使有变化,也只是“传统内的变化”。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形式一旦建立,就具有一种以公认方式进行延续的惯性力量和趋势。只要它们的环境不受西方直接影响,它们就经历着传统内的变化而不是变革。西方学者还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截然对立的,中国传统社会自身根本不具有进行现代变革的能力。这种观点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传统,其实质就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来取而代之,是一种十足的“西方中心论”。时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尤其是到了70年代,这种观点受到严重的挑战,不再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

第二,进入7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转变了立场,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融合。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存在着某些有助于现代化的“现代化的潜力”。例如,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提出,尽管跟西方发生接触,使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但这一传统具有两个十分有利于中国“异常杰出地屹立在现代世界上”的特征。这就是,“珍视历史”和“关心政治生活(把政治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①虽然这些学者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不少有见地的观点,但是由于海外学者的阶级局限性和对中国历史传统了解不够深入,他们没有能够分清中国传统中哪些是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哪些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当然,他们也就无法探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的契合点。

第三,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更是系统地运用西方现代化

^① 参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译本序言,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成果,从而把中国现代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成果体现在美国学者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作者在此书中声称,他们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中国社会中哪些因素有助于现代化,哪些因素阻碍着现代化,并对现代化发生的速率和模式加以评估……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① 基于此,作者较为公正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对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波折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该书在分析问题时,主要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理论。由于这两种理论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所以给《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带来了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它不仅忽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多处批评所谓“激进主义”,而且把经济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唯一的进程,否认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主权完整等正确目标;二是在比较俄国、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结构时,始终围绕着“集权与分权”,而不是围绕着专制与民主的问题进行分析。正因为如此,该书忽视了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改革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的倡导,更回避了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的事实。其实,民主的旗帜在中国近代的政治现代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重

^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心,转移到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上来。罗兹曼主编的《东亚地区的儒家传统及其现代转变》是其中的代表作。在罗兹曼看来,在整个东亚地区,人们普遍认识到,每个国家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国根”,从那里借用过来的文化资源都有一个儒家内核。因此,东亚各国,不管它们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发展都贯穿着一定的“共同的因素”。接着,罗兹曼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儒家传统的诸多内涵,并且力图揭示儒家传统是如何渗透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决定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诚然,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源远流长,极大地影响着该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但是,作者据此而抹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这无疑是错误的。至于该书对儒家文化与中国社会生活与现代化关系的分析,也失之偏颇。此外,此书的概念使用存在着问题,如作者把中国社会主义称为“儒家社会主义”等。

第五,通过研究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学者们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最初尝试。他们认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毛泽东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少苏联化倾向的人物。五十年代中期,他就发动大家齐心协力使中国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①此外,学者们还批驳了一些人凭空指责毛泽东不注重经济建设和枉言毛泽东没有现代化思想的观点,指出:“在毛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他从未停止过对迅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用数量词来界定的进步的号召:吨钢,吨粮,

^①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奈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以及所有的这些。工业化和现代化也是毛主义非常好的思想。”“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毛的现代化思想中主要和关键的一部分。”^①遗憾的是,这些学者未能把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实践予以全面地论述和展开,故而也就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挫折。

不可否认,西方学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以不同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观点新颖、独特,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西方学者把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与失败都归咎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现代化所造成的阻碍,则不能不说是他们研究的一个误区。此外,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至于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则尚未全面展开。

国内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以罗荣渠为代表,一大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20余年来,学者们通过辛勤的耕耘,出版了一大批专著,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一是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路。在这方面,罗荣渠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填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空白。罗先生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他的两部传世之作《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之中。罗荣渠以他所创立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指导,详细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变

①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施拉姆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08页。

革中的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交织和三种基本矛盾(侵略与反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重叠而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强调从鸦片战争到如今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包含着许多取向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的分过程。罗荣渠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要把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置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新工业革命的大趋势、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趋势相继出现、不断变化的世界大环境中考察,在纵向与横向(即国际的)比较中探讨和定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二是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罗荣渠认为中国现代化模式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在研究东亚现代化进程时,他把东亚现代化总结为三大类型: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指出中国型的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与帝国解体,但边缘化的程度不如第二类国家深重,通过革命化的重组过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① 有的学者还分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特点及其成因。例如,严立贤通过研究中日工业化的不同道路,指出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即从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中寻找。他认为,西欧、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缺乏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而使自上而下道路也走不通这样三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三是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新形势下,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仍然不容忽视。为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全部中国文化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耿云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批评了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欧化”或“西化”运动,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领袖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或“全盘西化论”者的观点。文章提出,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批判运动,而且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是中西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运动。文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效,是它的科学启蒙作用,即为民主、科学的发展开辟先路。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难以持久,是因为没有随后而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支撑,而最终陷于失败的境地。因此,不能把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发达、中国现代化的延误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在“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一文中,王富仁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要从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来认识。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但洋务派、维新派都割裂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民主革命派也没有作出全面、完整和独立的文化理论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否定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所追求的目标。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贡献是提出了精神文化的改造,其思想旗帜是人的精神解放。

此外,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书中,也讨论了传统文化问题。在论证传统向现代转型时,罗先生指出,就整体而言,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反现代化的。历代积淀下来的“道统”观、“夷夏”观等构成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使